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张柏然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韩江洪 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张柏然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韩江洪 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 / 韩江洪编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 张柏然总主编

ISBN 978-7-305-09834-5

I. ①当… II. ①韩… III. ①翻译理论—西方国家—
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71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 主 编 张柏然
书 名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
编 著 韩江洪
责任编辑 张 静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 字数 633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834-5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顾问(按首字母排序)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学院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王宏印	南开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总 序

张柏然

到了该为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说几句话的时候了。两年前的炎炎夏日,南京大学出版社责成笔者总揽主编分别针对高等院校翻译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与研究需求的研究型系列读本和导引。俗话说,独木难撑大厦。于是,笔者便千里相邀“招旧部”,网罗昔日在南大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十八罗汉”各主其事。寒来暑往,光阴荏苒,转眼两年过去了。期间,大家意气奋发,不辞辛劳,借助网络“上天”,躲进书馆“入地”,上下求索,查阅浩瀚的文献经典,进而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披沙拣金,辨正证伪,博采众长,字斟句酌,终于成就了这一本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教材。

众所周知,教材乃教学之本和知识之源,亦即体现课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甚至教学模式的知识载体,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引导教学方向、保证教学质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高校组编、出版的翻译教材逐年递增。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检索主题名含有“翻译”字段的图书,检索结果显示,1980至2009年间,我国引进、出版相关著作1800余种,其中,翻译教材占有很大的比重。近些年来,翻译教材更是突飞猛进。根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共有1000多种。^{*}这一变化结束了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教材“一枝独秀”的境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由此也反映了我国高校翻译教学改革的深化。

但是,毋庸讳言,虽然教材的品种繁多,但是真正合手称便的、富有特色的教材仍属凤毛麟角。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其中大多都具有包打翻译学天下的纯体系冲动,并没有打破我国既往翻译教材编写从某一理论预设出发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和几大板块的框架结构。从教材建设看,我国翻译理论教材在概念陈设、模式架构、内容安排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雷同化现象。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进,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有鉴于此,我们组编了“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和“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这两套系列教材。前者系研究生用书,它包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文论与翻译研究导引》、《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导引》、《文学翻译研究导引》、《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英汉口译理论研究导引》、《语料库与翻译研究导引》和《术语翻译研究导引》等10册;后者则以本科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它包括《翻译概论读本》、《文化翻译读本》、《文学翻译读本》、《商务英语翻译读本》、《法律英语翻译读本》、《传媒英语翻译读本》、《科技英语翻译读本》、《英汉口译读本》、《英汉比较与翻译读本》和《翻译资源与工具读本》等10册。这两套教材力图综合中西译论、相关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语

^{*} 转引自曾剑平、林敏华:《论翻译教材的问题及编写体系》,《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11月。



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结合目前高校翻译教学和研究实践的现状进行创造性整合,编写突出问题型结构和理路的读本和导引,以满足翻译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与研究的需求。这是深化中国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尚未引起翻译理论研究界和教材编写界的足够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课题,基本上还是一片多少有些生荒的地带。因此,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就多少带有拓荒性质。这样,不仅大量纷繁的文献经典需要我们去发掘、辨别与整理,中西翻译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需要我们去探讨,而且研究的对象、范畴和方法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与确定。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这一课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却又变为克服困难的巨大动力,策励着我们不揣浅陋,迎难而上,试图在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这块土地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垦殖。

这两套研究型系列教材的编纂目的和编纂特色主要体现为: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是培养学生发问、好奇、探索、兴趣,即学习的主动性,逐步实现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及早进入科学研究阶段;不追求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突破讲授通史、通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引入探究学术问题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教材编写理念,填补国内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的欠缺;所选论著具有权威性、文献性、可读性与引导性。具体而言,和传统的通史通论教材不同,这两套系列教材是以问题结构章节,这个“问题”既可以是这门课(专业方向)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是这门课某个章节的主要问题。在每个章节的安排上,则是先由“导论”说明本章的核心问题,指明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接着,通过选文的导言,直接指向“选文”——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的范文,这样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更有示范性;“选文”之后安排“延伸阅读”,以拓展和深化知识;最后,通过“研究实践”或“问题与思考”,提供实践方案,进行专业训练,希冀用“问题”牵引学生主动学习。这样的结构方式,突出了教材本身的问题型结构和理路,旨在建构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与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年轻学子有机会接触最新成就、前沿学术和科学方法;强调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交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方法,未来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需要。

笔者虽说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但对编写教材尤其是研究型教材还是个新手。这两套翻译学研究型教材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全有赖各册主编的精诚合作和鼎力相助,全有仗一群尽责敬业的编写和校核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套系列教材的最后编辑工作中,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董颖和责任编辑裴维维两位女士全力以赴,认真校核,一丝不苟,对保证教材的质量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谨向他(她)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而言之,编写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还是一项尝试性的研究工程。诚如上面所述,我们在进行这项“多少带有拓荒性质”的尝试时,犹如蹒跚学步的孩童,在这过程中留下些许尴尬,亦属在所难免。作为教材的编撰者,我们衷心希望能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再版修订,进而发展出更好更多翻译学研究型教材来。

是之为序。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撰于沪上滴水湖畔临港别屋

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西方翻译理论陆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中国翻译界学人运用西方翻译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大大促进了我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翻译事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许多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都开设了“西方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入门”等课程。近年来若干种教授西方翻译理论的教材陆续出版,然而符合我国国情、切合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需求的研究型教材极为少见。有的教材只提供西方翻译理论经典论文的内容概述和评介,研究生看不到论文本身,不识其本来面目;有的教材有导引,但只提供经典论文的汉语译文,让读者时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的感觉,殊不知此理论已非彼理论也;有的教材按流派或学派选编了未经翻译的经典论文,但没有任何导引。为帮助读者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经典,培养读者的研究意识,提高读者开展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能力,编者精选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及其研究的学术论文,编写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这本研究性教材。

为突显本教材的研究性,编者首先以问题为主题和导向,选择触及翻译学研究重要问题的学术文章,并围绕这些问题设计需要读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或研究课题。其次,在决定相关学术论文的取舍时,编者重视选文的代表性和经典性。这些文章代表了特定课题研究的较高研究水平,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成果,体现了学界对相关研究课题的当下思考。这些选文可以作为具体研究案例,读者可以通过研读文章掌握相关课题的研究方法及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

本书共分十章,分别是“可译性与对等”、“翻译转移”、“多元系统与翻译”、“翻译规范”、“翻译的功能与目的”、“语域与翻译”、“规化和异化”、“文化研究与翻译”、“哲学与翻译”、“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每章由“导论”和“选文”两大部分组成。

“导论”部分简要介绍某个问题或主题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界的研究状况,梳理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和代表性研究成果。

“选文”部分提供两类学术论文。一类围绕每章主题,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为依据,每章提供 3~4 篇西方翻译学者撰写的关于该主题的代表



性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有些选自韦努蒂编的《翻译研究读本》，其他选自近年来国外出版的翻译学专著和学术期刊。另一类紧扣每章主题，每章提供一篇中国翻译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目的是使研究生读者了解中国学者是如何研究西方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翻译理论的。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均选自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外语类核心期刊。编者在收录这两类学术论文时，秉承尊重作者的原则，力求保持选文的原汁原味及其完整性。

每篇选文配有“导言”、“延伸阅读”和“问题与思考”。“导言”位于选文的正文之前，介绍所选文章的来源及其主要内容。“延伸阅读”提供了一些专题论文或著作。阅读这些论著，读者可以深化对相关研究课题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问题与思考”提供一些有助于读者理解选文内容的问题或者需要读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柏然教授和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著者为韩江洪，张淑艳同志也参与并做了部分工作。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诸多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韩江洪

目 录

第一章 可译性与对等	1
导 论	1
选 文	2
选文一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2
延伸阅读	8
问题与思考	8
选文二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9
延伸阅读	24
问题与思考	25
选文三 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和等值	25
延伸阅读	30
问题与思考	30
第二章 翻译转移	31
导 论	31
选 文	32
选文一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32
延伸阅读	41
问题与思考	42
选文二 Translation Shifts	42
延伸阅读	49
问题与思考	49
选文三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50
延伸阅读	61
问题与思考	62
选文四 鲁文-兹瓦特论翻译转移的比较	62
延伸阅读	71
问题与思考	72
第三章 多元系统与翻译	73
导 论	73
选 文	74
选文一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74
延伸阅读	80
问题与思考	80
选文二 Translation as System (Excerpt)	81
延伸阅读	88



问题与思考	89
选文三 佐哈尔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批评性阐释	89
延伸阅读	93
问题与思考	94
第四章 翻译规范	95
导 论	95
选 文	96
选文一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96
延伸阅读	110
问题与思考	111
选文二 Translation Norms (Excerpt)	111
延伸阅读	118
问题与思考	118
选文三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	119
延伸阅读	124
问题与思考	124
第五章 翻译的功能与目的	125
导 论	125
选 文	126
选文一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126
延伸阅读	137
问题与思考	138
选文二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138
延伸阅读	150
问题与思考	151
选文三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Excerpt)	151
延伸阅读	162
问题与思考	162
选文四 翻译目的论及其文本意识的弱化倾向	162
延伸阅读	168
问题与思考	168
第六章 语域与翻译	169
导 论	169
选 文	170
选文一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Linguistic Description versus Social Evaluation	170
延伸阅读	185
问题与思考	185
选文二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Excerpt)	185
延伸阅读	196
问题与思考	196
选文三 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批评	197



延伸阅读	205
问题与思考	205
第七章 归化和异化	206
导 论	206
选 文	207
选文一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207
延伸阅读	221
问题与思考	221
选文二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Excerpt)	222
延伸阅读	237
问题与思考	237
选文三 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	238
延伸阅读	245
问题与思考	245
第八章 文化研究与翻译	246
导 论	246
选 文	247
选文一 O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Excerpt)	247
延伸阅读	258
问题与思考	258
选文二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259
延伸阅读	279
问题与思考	279
选文三 Gender in Translation (Excerpt)	280
延伸阅读	290
问题与思考	290
选文四 斯皮瓦克翻译思想探究	291
延伸阅读	297
问题与思考	297
第九章 哲学与翻译	298
导 论	298
选 文	299
选文一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299
延伸阅读	311
问题与思考	311
选文二 After Babel (Excerpt)	312
延伸阅读	317
问题与思考	317
选文三 本雅明说的是啥?	318
延伸阅读	329
问题与思考	329



第十章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	330
导 论	330
选 文	331
选文一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Excerpt)	331
延伸阅读	335
问题与思考	336
选文二 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ransfer	336
延伸阅读	358
问题与思考	358
选文三 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及理论融合——评《翻译研究指南》	358
延伸阅读	361
问题与思考	361
参考文献	362

第一章 可译性与对等

导 论

什么是可译性？可译性是指这样一个范畴：某个语义由一种语言译入另一种语言，无须经历剧烈的变化。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赞同可译性，因为在他看来，翻译存在于语言内部、语言之间和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他认为，差异等值是每种语言的基本问题。在词的层面上，某个词的语法意义使其可能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具有相同语法意义的词来翻译，卡特福德(John C. Catford)认为这种语言差异就其功能来说与对等问题没有什么关联。其他学者注意到单词层面上的不兼容性要么是由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现象的差异引起的，要么是由于目标语中缺乏称谓源语文化某个特定概念的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可译性只是发生于单个词的层面，通常可以在确保保留源语语义特征的前提下通过解释而规避掉。另外，在词的层面上还可以使用补偿等翻译策略来处理这种不可译性。看语言现象是否具有可译性，不能只考虑能否保留其基本的语义特征。隐含意义、搭配意义等语义维度的存在向我们表明，不存在独立于任何语言之外的绝对意义，而可译性只是一个有限概念。此外，诸如寓意之类的文本语境特征，以及双关语、单词游戏和诗学手段等形式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很难保留，这说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由具体的文本而产生，因此必须抛弃绝对可译性的概念。可译性概念必须与翻译的每个具体实例或具体行为联系起来考虑，还必须与源语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译者遵循的翻译原则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对等(equivalence)被许多学者用于描述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或两种更小的语言单位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相关联的程度。对等在一定意义上是某一语言的语词在不同语言里的对应形式。不过，雅各布森在其名作“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1959)里提出“差异中的对等”(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这一术语，强调了与对等相关的一些复杂因素。对等涉及的问题很多，对等概念本身也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赫曼斯(Theo Hermans)称对等为一个“麻烦的概念”。在英语里，equivalence一词有多重语义，西方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对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理解因此也因人而异。有些学者把翻译中的对等与数学中的对等等同起来，认为翻译中的对等不仅具有对称性而且具有可逆性。还有些学者对翻译对等的精确程度要求过高，结果造成其理论缺乏实践指导意义。卡特福德把翻译视为用目标语中对等的语篇材料替换源语的语篇材料，认为翻译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翻译对等的本质和条件。他把翻译对等看做是可量化的，翻译因而就是从目标语中所有的潜在的对等表达式中选出最合适的对等语来替换源语中的语项。卡特福德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他所处时代语言学的局限性。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指出，卡特福德的观点其实预设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称程度，甚至曲解了翻译



的基本问题,因为它把翻译降解为简单的语言练习,忽略了文化、文本和其他情境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在翻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观念导致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划分对等概念,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奈达(Eugene Nida)的划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西方学者起初将 equivalence 这一术语引入翻译研究,意在科学地定义翻译,孰料这一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歧义化。为了摆脱这一困局,有的学者干脆主张翻译研究放弃使用对等概念。赫曼斯就曾批评图里(Gideon Toury)在其翻译规范理论中仍然保留对等观念,因为这会使人忽视翻译的不对等的方面,掩盖了翻译被操纵的实质;而规范概念正好把翻译的不对等方面推向前台。翻译的对等观念完全是虚构和妄想,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文的字句不同,意义有异。不仅语言随着翻译变化,而且叙述意图、时间、功能和情景全都随之改变。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无法被清除,除非取消翻译或译文本身。翻译受多种规范的制约,必然是混杂的、不透明的和有差异的。可能在实际翻译中需要对等的观念,但这一观念纯属虚构;某一层面上的对等总是被其他层次上的差异抵消。

本章共选三篇文章。第一篇“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研究了等值、可译性等问题,是雅各布森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的开先河之作;第二篇“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的作者是奈达,该文较全面地阐发了他本人的动态对等思想;第三篇《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和等值》是中国学者蔡毅撰写的,该文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核心概念的演变情况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本人的观点。



选 文

选文一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Roman Jakobson

导 言

本文选自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编的《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西方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直译、意译等问题展开,且讨论都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主观性。雅各布森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有关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划分,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人们习得某个词的语义,不一定要有见过或接触过该词所指事物的认知经验,这一点颇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观点相异。语际翻译可以实现信息等值,而在语符单位之间不可能有完全的等值。不同语符之间的等值是语言的根本问题和语言学的主要关注对象。雅各布森是语言共性论者,他认为不同的语言都具有相同的表达力。由于诗歌的语法范畴、词汇形式都传达出特殊的意义,而不同语言间的

语法范畴、词汇形式差异很大,因而诗歌是不可译的。本论文从语言学、符号学角度探讨了语言的意义、等值和可译性,其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开启了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大门。

According to Bertrand Russell, “no one can understand the word ‘cheese’ unless he has a nonlinguistic acquaintance with cheese.”^① If, however, we follow Russell’s fundamental precept and place our “emphasis upon the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s,” then we are obliged to state that no one can understand the word “cheese” unless he has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this word in the lexical code of English. Any representative of a cheese-less culinary culture will understand the English word “cheese” if he is aware that in this language it means “food made of pressed curds” and if he has at least a linguistic acquaintance with “curds.” We never consumed ambrosia or nectar and have only a linguistic acquaintance with the words “ambrosia,” “nectar,” and “gods”—the name of their mythical users; nonetheless, we understand these words and know in what contexts each of them may be use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cheese,” “apple,” “nectar,” “acquaintance,” “but,” “mere,” and of any word or phrase whatsoever is definitely a linguistic, or to be more precise and less narrow, a semiotic fact. Against those who assign meaning (*signatum*) not to the sign, but to the thing itself, the simplest and truest argument would be that nobody has ever smelled or tasted the meaning of “cheese” or of “apple.” There is no *signatum* without *signum*.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cheese”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a nonlinguistic acquaintance with cheddar or with camember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verbal code. An array of linguistic signs is needed to introduce an unfamiliar word. Mere pointing will not teach us whether “cheese” is the name of the given specimen, or of any box of camembert, or of camembert in general or of any cheese, any milk product, any food, any refreshment, or perhaps any box irrespective of contents. Finally, does a word simply name the thing in question, or does it imply a meaning such as offering, sale, prohibition, or malediction? (Pointing actually may mean malediction; in some cultures, particularly in Africa, it is an ominous gesture.)

For us, both as linguists and as ordinary word-users, the meaning of any linguistic sign is its translation into some further, alternative sign, especially a sign “in which it is more fully developed,” as Peirce, the deepest inquirer into the essence of signs, insistently stated.^② The term “bachelor” may be converted into a more explicit designation, “unmarried man,” whenever higher explicitness is required. We distinguish three ways of interpreting a verbal sign: It may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 into another

① Bertrand Russell, “Logical Positivism,”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IV (1950), 18; cf. p. 3.

② Cf. John Dewey, “Peirce’s Theory of Linguistic Signs, Thought, and Meaning,”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XLIII (1946), p. 91.



language, or into another, nonverbal system of symbols. These three kinds of translation are to be differently labeled:

- (1)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
- (2)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
- (3)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

The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f a word uses either another, more or less synonymous, word or resorts to a circumlocution. Yet synonymy, as a rule, is not complete equivalence. For example, "every celibate is a bachelor, but not every bachelor is a celibate." A word or an idiomatic phrase-word, briefly a code-unit of the highest level, may be fully interpreted only by means of an equivalent combination of code-units, i. e., a message referring to this code-unit: "Every bachelor is an unmarried man, and every unmarried man is a bachelor," or "every celibate is bound not to marry, and everyone who is bound not to marry is a celibate."

Likewise, on the level of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there is ordinarily no full equivalence between code-units, while messages may serve as adequate interpretations of alien code-units or messages. The English word "cheese" cannot be completely identified with its standard Russian heteronym "сыр," because cottage cheese is a cheese but not a сыр. Russians say: *принеси сыру и творогу* "bring cheese and [sic] cottage cheese." In standard Russian, the food made of pressed curds is called сыр only if ferment is used.

Most frequently, however, translatio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substitutes messages in one language not for separate code-units but for entire messages in some other language. Such a translation is a reported speech; the translator recodes and transmits a message received from another source. Thus translation involves two equivalent messages in two different codes.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Like any receiver of verbal messages, the linguist acts as their interpreter. No linguistic specimen may be interpre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without a translation of its signs into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system or into signs of another system. Any comparison of two languages impl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mutual translatability; widespread practice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particularly translating activities, must be kept under constant scrutiny by linguistic science. It is difficult to overestimate the urgent need for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ial bilingual dictionaries with careful comparative definition of all the corresponding units in their intention and extension. Likewise differential bilingual grammars should define what unifies and what differentiates the two languages in their selection and delimitation of grammatical concepts.

Both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bound with intricacies, and from time to



time attempts are made to sever the Gordian knot by proclaiming the dogma of untranslatability. "Mr. Everyman, the natural logician," vividly imagined by B. L. Whorf, is supposed to have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bit of reasoning: "Facts are unlike to speakers whose language background provides for unlike formulation of them."^①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re were fanatic visionaries who argued in Soviet periodicals for a radical revision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and particularly for the weeding out of such misleading expressions as "sunrise" or "sunset." Yet we still use this Ptolemaic imagery without implying a rejection of Copernican doctrine, and we can easily transform our customary talk about the rising and setting sun into a picture of the earth's rotation simply because any sign is translatable into a sign in which it appears to us more fully developed and precise.

A faculty of speaking a given language implies a faculty of talking about this language. Such a "metalinguistic" operation permits revision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vocabulary use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both levels—object-language and metalanguage—was brought out by Niels Bohr: All well-defin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must be expressed in ordinary language, "in which the practical use of every word stands in complementary relation to attempts of its strict definition."^②

All cognitive experience and its classification is conveyable in any existing language. Whenever there is deficiency, terminology may be qualified and amplified by loan-words or loan-translations, neologisms or semantic shifts, and finally, by circumlocutions. Thus in the newborn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Northeast Siberian Chukchees, "screw" is rendered as "rotating nail," "steel" as "hard iron," "tin" as "thin iron," "chalk" as "writing soap," "watch" as "hammering heart." Even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circumlocutions, like "electrical horse-car" (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 конка), the first Russian name of the horseless street car, or "flying steamship" (*jena paragot*), the Koryak term for the airplane, simply designate the electrical analogue of the horse-car and the flying analogue of the steamer and do not impede communication, just as there is no semantic "noise" and disturbance in the double oxymoron "cold beef-and-pork hot dog."

No lack of grammatical device in the language translated into makes impossible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entire conceptu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 The traditional conjunctions "and," "or" are now supplemented by a new connective—"and/or"—which was discussed a few years ago in the witty book *Federal Prose—How to Write in and/or for Washington*.^③ Of these three conjunctions, only the latter occurs in one of the Samoyed languages.^④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in the inventory of conjunctions, all three varieties of messages observed in "federal prose" may be distinctly translated both into traditional

① Benjamin Lee 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 1956), p. 235.

② Niels Bohr, "On the Notions of Causality and Complementarity," *Dialectica*, I (1948), 317f.

③ James R. Masterson and Wendell Brooks Phillips, *Federal Prose* (Chapel Hill, N. C., 1948), p. 40f.

④ Cf. Knut Bergsland, "Finsk-ugrisk og almen språkvitenskap,"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XV (1949), 374f.